

# 从“双一流”视角审视我国高职院校建设的 价值追求、核心内容与路径选择

杨红荃 李萌仕

**[摘要]**以“双一流”视角审视我国高职院校建设,探索符合高职教育特色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对于推动我国高职院校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双一流”的目标和理念建设高职院校,有助于提升我国高职教育的社会信任感、经济支撑度和国际影响力。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加强院校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双师”素质,全面推进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和高职院校的一流专业建设,以期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满足产业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双一流” 高职院校建设 价值追求 “双师型” 现代学徒制

**[作者简介]**杨红荃(1972-),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李萌仕(1993-),女,湖北潜江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在读硕士。(湖北 武汉 43006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湖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调研课题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中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发展”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HBZJ2018016)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07-0017-08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19.07.003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高职院校的“双一流”建设主要是在承袭本科“双一流”总体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结合高职教育的鲜明特色和独特类型,在“双一流”的语境下建设一流高职院校和一流高职专业,不是高职示范和骨干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对创新高职的同义替换,而是从高等教育的视角重新审视高职院校的建设与发展。

## 一、“双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价值追求

(一)社会价值:满足社会大众对优质高等职业教育的追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对物质文化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对物质文化的全盘抛弃,而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时代选择。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对物质文化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更注重社会大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教育作为“民生三感”的智慧支持,其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对“民生三感”的真实感受和切身体会。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他指出,就数量而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时即进入大众化阶段,当毛入学率超过50%时即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我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2.7%,即高等教育正在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变。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共计2596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1359所,占到普通高等学校的一半。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多样性的教育形式,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指出的,“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相比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接受每一位渴望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通过技能的传授和专业的讲解,引导受教育者找到合适的社会角色,赋予更多青年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我国高职教育得到大力发展,高职院校的数量不断增加,前期的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量的累积和数的扩张上。但是,优质的甚至说有效的高等教育资源极其有限。与之前“有学上”的出发点相比较,社会大众对教育的初衷逐渐转变为“上个好学校”。只有量与质相统一、同步提升的高等教育才是社会大众真正期待的教育,即教育资源由又快又好发展向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当前的高职院校不再是高考失败者的“收容所”,而是培养社会各行各业优秀员工的专业院校,更是支撑国家工业转型升级迈向“中国制造2025”的人才储备器。

(二)经济价值: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aul Romer)、卢卡斯(Robert Lucas)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技术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且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特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可以使自身获得收益,而且能够促进其他要素收益的增长,从而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sup>①</sup>这一理论充分证明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力资源质量的共生关系。随着产业分工与合作、经济结构调整、工业化转型升级,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

力资源的专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当知识与技术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时,作为融合二者的高等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高职院校的“双一流”建设不仅是高职教育自身对质的内在诉求,还是区域经济对高职教育优质化升级的现实选择。《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描绘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蓝图,“到2020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1.4亿人,其中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达到39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8%左右”,以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局势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日益强化,高职教育以培养技术技能劳动者为特征,以直接性途径为经济效益做出贡献。“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分析,从全国来看,2001—2012年,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的贡献达到0.36%,高于本科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0.23%。综合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市的总体情况,东部11个省市的高职教育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0.61%,中部地区高职教育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0.50%,西部地区高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0.34%。”<sup>②</sup>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在普适性与特殊性、整体与部分的逻辑指导下,我国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布局,优化不同区域的经济重点,协调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加强区域发展的秩序化和整体化。稳定、合理的产业布局为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厚实的产业支撑和岗位支持。同时,只有高水平的高职院校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职业人才,才能为东部地区输送符合区域产业所需的合格劳动力,以此形成高职院校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三)文化价值:符合高职院校对内在文化自信的需求

《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指

出：“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被边缘化，在职业教育领域示范引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目前，高职发展模式优势和存在感趋弱并存，普遍在办学理念上缺乏方向自信，在专业教学上缺乏模式自信，在人才培养上缺乏目标自信。”<sup>③</sup>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高职教育缺乏对高职院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建设。这种自我内涵和内在价值的空缺，通常是由文化意识不强和文化积淀不足造成的。高职教育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但因为历史原因，造成“身份矮化”，导致“士气低下”。由于职业教育的职业导向属性，许多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设定和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将技能训练作为人才培养的唯一目的，忽视文化功能，甚至对院校文化建设避而不谈。“诚然，职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价值追求，但不能因技术性的逻辑推演和职业性的功利价值而忽略高职教育的理性价值。”<sup>④</sup>高职院校的理性价值在于文化育人而不是机械培训，应着眼于人才培养的长期发展。高职院校应该在“高等性”和“职业性”的互补性融合中，形成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文化。德国政府重点关注职业教育文化的形成，把“双元制”模式发展成“双元制”职业教育文化，并且引入各行各业。这种以文化视野来审视职业教育的方式，不仅吸引了更多德国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还提高了职业教育在全国的文化认同度和文化自信感。《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明确提出：“高职院校要主动承担促进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的责任，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与工艺。”健全和完善高职院校的文化功能，突出其文化属性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层面的强调重点之一。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要求在全国倡导工匠精神，以浸润式文化遵从，培育大国工匠，保证产品质量，推进产品创新。这些都可以看作高职院校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而这些内涵需要众多精益求精的手艺人和工匠人来保持、传

承和弘扬。只有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上坚定方向自信，在专业教学上树立模式自信，在人才培养上明确目标自信，才能培养出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才能唤醒高职院校的文化自觉，树立高职院校的文化自信。

## 二、“双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

(一)打造三维质量指向的优质专业，稳固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关键要素

美国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由学科与院校构成的矩阵结构”<sup>⑤</sup>。因此，在构建完善的高等职业教育矩阵结构中，专业建设理应成为高职院校建设工作中的一项硬性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明确提出，到2018年建成200所左右优质高职院校，同时指出优质校遴选要具备“办学定位准确、专业特色鲜明、社会剪务能力强、综合办学水平领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契合度高、行业优势突出”的属性特征。基于此，高职院校建设一流专业要遵循社会信任感、经济信赖度、国际影响力三个维度。社会信任感指学生满意、家长肯定。优质的专业建设要满足学生和家长的期待，以清晰的专业设置、完善的课程体系、完备的教学条件帮助毕业生顺利进入劳动市场，找到与专业相吻合的工作。经济信赖度包括企业认同、行业认可。专业是高等院校与经济发晨的紧密接口，一流专业建设必须重点关注学生培养的三个环节：第一，科技更新引发产业升级重构，导致行业与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呈现不稳定性。在专业设置过程中，必须通过实际调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了解行业和企业劳动力缺口和技术需求。第二，在培养过程中，企业应参与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实施，在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下，引导学生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接受岗位能力的训练。第三，院校要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调查，特别是就业与专业之间的吻合度和相关度，以及企业对毕业生的满意程度。

国际影响力旨在通过打造中国样本引领发展,实现专业在“美美与共”中的“各美其美”。高职院校在当前“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背景下,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增强专业水平的国际影响力。从人民满意到行业肯定,再到国际水平,三个维度层层递进,形成兼具连贯性和一体化的专业建设评估维度,有利于更好地促进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

(二)建设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巩固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人力资源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人力资本因具备了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及组织性等特征而成为企业有价值的战略资源和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sup>⑥</sup>这些特征集成人力资本的战略价值。具有战略价值的教师群体,不仅是构成高职院校办学资源的基础性工程,还是推动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人力资源主体。2016年10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教师[2016]10号)明确了“加快建成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目标任务。“双师型”教师作为高职院校的一种特殊组织资源,其内涵的界定要更符合职业教育的特殊遵从。如何从同质化的教师资源中甄别、选聘具有优秀基因的“双师型”教师,并且在高等教育“双一流”目标驱使下和职业教育组织情境中培养、补充、激活、调配“双师型”教师队伍,以期构建作用机制,凝聚为优质资源和机构化组织集合,是目前“双师型”教师建设的焦点。根据政策文本和学者们的各抒己见,“双师型”教师被赋予了多元视角,内涵解析也不一而足,如聚焦职务的“双职说”、突出证书的“双证说”、强化能力的“双能说”、重视结构的“双元说”等。诸如此类表达“井喷式”生长,实则让“双师型”教师陷入界定多样化的尴尬境遇,也加剧了“双师型”教师身份认同的角色窘迫。揆

诸历史,我国公布的职业教育教师标准,如2013年9月颁布《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只是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做出了模糊性要求,高职教育教师的资格准入标准暂付阙如。目前我国一些省级单位已经公布了“双师型”教师认证标准,试图以省级“双师型”的标准界定消解“双师型”教师身份界定的不确定性。我国亟待结合当前时代背景,从师德师风、专业能力、生涯规划、结构组成等方面制定出一套内容清晰、易于操作且职教特色鲜明的“双师型”教师标准,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以期为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提供人力资源基础。

(三)优化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特色载体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sup>⑦</sup>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的根本任务。就高职院校而言,无论是前期的示范校、骨干校计划,还是目前的优质校建设方案,无一不围绕着内涵式升级的核心,而人才培养质量是高职院校内涵式升级的首要问题,也是高职院校质量评估的关键所在。从实践层面而言,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和一流专业建设都包含人才培养要义,因此将人才培养作为持续探索重点和理性规约成为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应然选择,人才培养也成为贯穿高职一流院校建设和一流专业建设的结构逻辑起点。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标志性特色,为企业、行业生产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员工。然而,目前我国校企合作仍然在重重困难中踽踽前行,只有持续加强企业和院校之间的联系,不断推进工学结合,深化改革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进一步增强高职院校人才输出服务于持续壮大的传统优势产业、迅速崛起的现代服务业、

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等各产业升级的能力。杜威认为实践性知识不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应该在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建立情境性联系。在此基础上,工作场所学习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的主旨是以个人职业成长和组织发展为目标,以实践为取向,通过实际工作获取相关知识,习得工作技能,发展职业能力,促进组织成长。现代学徒制强调工作场所学习的知识观,其本源特征在于企业参与技术技能劳动者生产能力获得和职业素质养成的过程。“德国34%的企业主动参与学徒培训,规定60%的时间用于学习实践操作技能,40%的时间用来学习专业理论知识。英国企业不仅与学生签订相关协议,并且在学徒制开始前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考核,以了解学生的兴趣,有针对性地开发学生的专业能力。”<sup>⑧</sup>我国试点推行的实践基础和国外的借鉴经验充分证明了现代学徒制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它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是学生在工作情境中掌握系统技能知识结构的必要条件,是凝聚师徒关系中传递默会知识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也在合作育人理念下明确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对于人才培养的责任和权益,有利于通过实质性规约和有效性联系增强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力度。

### 三、“双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路径探索

(一)完善政策制度,增强决策机制与顶层设计的契合

回顾历史,通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等重点战略决策,一批示范院校建设和骨干专业建设在高职教育的属性基础上取得了全新突破和重大进展,不仅激活了高职院校整体提升的活力,还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凡事预则立,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为避免“双一流”建设流于形

式,或者由于组织惰性而造成质量缺位,应该加快从顶层设计上对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做出清晰的整体规划和重点布局,既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加强优质资源整合,也要以反思的视角正确看待高职院校在前期建设中出现的固化问题,做出严谨的系统谋划。围绕“一流院校”和“一流专业”两个要点,明确总体建设目标是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当务之急,即厘清建设重点、理清建设思路、明晰质量标准、加强顶层设计。

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是一项兼具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跨界问题,更需要总体目标和顶层设计的指导,拥有一套统一的建设方案和清晰的计划指导是明确高职院校“双一流”方向和承认高职教育特殊性的有力保障。通过政策先行引导和制度前置规约,对职业教育事业进行规范和保障,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进行管理的模式。2014年,欧洲职业教育质量体系框架的颁布,立足于帮助成员国推动和监测职业教育体系,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整体发展。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于2016年对技能培训与教育进行改革,并公布《16岁之后的技能培训计划》,以政策性工具为表征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系统规划。揆诸“双一流”本科建设,《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总体要求、建设任务、改革任务、支持措施和组织实施等层面,对如何建设本科“双一流”做出了顶层设计。为了加快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步伐,不但需要科学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坚持目标导向,突出发展方向,强化质量杠杆,激活改革动力。

(二)加强院校建设,促进管理运行与办学质量的吻合

如何在现代职业院校管理理念下,提升高职院校提供职业教育服务的能力,是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2017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以“2017—2018年度职业教

育与培训投资报告”为指导,公布“昆士兰州职业教育质量框架”,聚焦于提高职业教育机构(院校)的服务质量。择其善者而从之,基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职业教育改革的新举措,我国在“双一流”高职院校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制定既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又具有高职院校特色的管理机制,并以此成为提升高职院校管理水平的强力助推器。根据现代系统论的观点,高职院校的一流建设作为一个整体,除了需要遵循科学的管理理念,制定院校章程引导依法治校之外,其综合水平还取决于内部治理结构、协调沟通机制、质量监督机制、信息技术水平和文化育人机制等多元要素优化重组的程度。

第一,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是指一方面要建立起“党委领导、院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sup>⑧</sup>的内部管理体制,厘清权责边界,完善决策机制,以期达到职责明确、权力制衡的目的;另一方面要设有学术委员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质量管理委员会等,发挥其在科研项目建设、专业准入与退出、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评估等工作中的作用。第二,协调沟通机制。协调沟通机制既指院校内部组织与组织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效工作衔接,又指高职院校能够切实落实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同治理。决策、执行与监督构成高职院校运行的长效机制,监督环节检验决策与执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由内部诊断和外部评价组合而成的质量监督机制逐渐形成。但是,院校内部诊断常常囿于自身利益主体而导致自我监督缺乏公信力。院校监督属于一种专业活动,应该交由专业的组织主导实施,独立于评价客体之外的第三方评价与院校自我诊断比起来,更具有公正性和客观性,能够弥补院校诊断监督主体上比较单一、评价角度过于狭窄等不足,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认知对院校质量进行监督。第三,信息技术水平。2015年,《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

出职业院校要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一流高职院校要建立起健全的信息化运行机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平台,引导教学形式、信息采集、安全校园等内容的多样性和规范化。第四,文化育人机制。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隐性基因,是院校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独特精神底蕴。文化可化有形为无形,源于院校组成中物态表征的凝聚;文化又可化无形为有形,在潜移默化中赋予校园元素不竭生命力,并外化施力于院校建设。校训、校风、校徽等都可以成为院校文化管理的特殊标识,德育教育、工匠精神、职业理念等都可以作为院校文化管理的优秀文化积累。

(三)深化产教融合,加快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的结合

“高职专业布局是指,区域内高等院校开设高职专业的布点及人才培养的类型分布结构安排。”<sup>⑨</sup>“我国《现代产业经济学辞典》将产业结构定义为各产业部门之间、各产业部门内部各行业及企业间的构成及其相互制约的联结关系,也指产业间各种经济要素的数量比例关系和质量协调关系。”<sup>⑩</sup>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提升和信息化与工业化进程加速的产物。与把学科建设看作“双一流”建设核心指标的本科教育不同,高职院校“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在于专业布点,以专业为载体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毋庸置疑,优质的专业布局是高等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结构的根基,是支撑优秀高职人力资源输出的基础。从教育角度出发,高职院校作为教育机构,拥有专业设置的自主权。从职业种类元素考虑,高职院校的专业布局因其自身的属性,受到产业结构的规约,必须主动适应产业调整,积极支持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从高职院校自身而言,第一,专业布局主动适应产业结构是保证人才质量的前提。人才在工作场所中的关键在于专业水平,这就要求

学生在校期间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职业操守,使专业程度和职业素养能够获得企业的承认和青睐。第二,专业布局自动对接产业结构是提高院校就业率的保证。就业率的高低是第三方机构对一所高职院校质量评估的重要因素,也是这所院校就业情况的直观表征。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结构是否在院校内部专业设置中充当主要角色,从根本上决定院校培养的学生能否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直接影响专业就业率和院校整体就业率。第三,专业布局积极支持产业结构是实现高职院校利益最大化的关键。产业结构是高职专业布局顺利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显性约束和前置规定。人才质量不断提高,就业率稳步攀升,高职院校的整体吸引力就能获得大幅改善,高职院校的利益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高职院校专业大类和专业口径是否能够覆盖产业结构和满足经济所需是判断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核心衡量标准。作为中部崛起和“五个湖北”建设的重要战略省份,湖北省将高职院校的布局结构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进行紧密联系,明确了为产业分类提供技术技能支持的专业大类和主要承接院校。2017年,湖北省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将继续发展壮大汽车、钢铁、石化、食品和药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同时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一批新兴产业。为了满足湖北省产业体系对技术技能劳动者的数量供给和质量支撑的要求,《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年)》中提出要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特色与社会需要,努力建成15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面向湖北省重点发展产业,合理布局19个专业大类,建成250个重点骨干专业,以更好地落实“双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并真正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区域产业结构现状作为高职院校专业布局的“指示器”,是突出高等职业教育推动

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举措。遵循产业结构调整,体现服务于区域经济的使命,并以此为逻辑理清专业大类的架构思路,将会加强院校专业规划与经济发展要求的同步调适。

(四)提升“双师”素质,实现教师能力与教育目标的契合

“为了积极应对社会和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对劳动者职业能力要求的变化,德国社会教育家梅腾斯于1974年提出了职业教育范畴内‘关键能力’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对关键能力的讨论逐渐演化形成了对职业行动能力这一概念的讨论。作为关键能力更高一级的能力概念,职业行动能力包括了关键能力所有要素,它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个性能力。”<sup>⑧</sup>这为德国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设置了可供参考的准绳,加强了职业人才输出的规范性,指引各职业院校从高规格、严要求出发,把高素质劳动者作为培养方向,从源头上把控教育质量的关口。高职院校一方面被赋予了高等学历教育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培养技术技能职业人才的使命。我国在布鲁姆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出新课改的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如果将三维目标引申到高职教育,那么知识与技能可以理解成学生不仅领会专业理论和知识,并且能掌握专业操作要领,熟练展开生产实践;过程与方法是指学生学会学习,善于运用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自主获得学习成果,实现技术技能的泛化,另外还包括团队合作能力、常规职业交往能力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指学生拥有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正确看待自己的专业价值,肯定并且履行自己的职业使命,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出彩。

2016年,《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教师〔2016〕10号)对职教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重点提升职教教师的理实一体教学能力、专业实践技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双师型”素质。高职院校,尤其是争创“双一流”的高职院校,需要一支优质精良的教学团队作为支撑,教师的综合能力和“双师”素养是高职院校完成教育目标的决定性因素。高职教师是具有跨界意识的职业,为更好地履行职业义务,高职教师应该同时具备教师和工程师两种身份,应该拥有师范能力、专业能力、创新能力等。师范能力是作为一名教师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主要包括师德师风、教育能力和教学能力。教师的道德水平在教师身份历史演进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高职教师必须守住道德底线,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地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教育能力是指高职教师从价值观上肯定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特性,掌握职业教育原理和心理学等知识,用先进的教育理念乐教施教;教学能力即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专业能力将职业教育教师和普通教育教师区分开来,是彰显职业特色的重要表现,其中包括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实践操作和企业实践拓展等。李克强总理在视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时指出,“双师型”教师是“工匠之师”。“匠”代表独具匠心,包含工匠精神,要求高职教师要到企业兼职轮岗,参加企业的实践培训,紧跟产业发展的方向,学习专业领域的最新知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双师型”教师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在校企合作的平台上协同创新,自主主持或者参与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寻找产业升级的突破点,以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生产实践,更有利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基于“双一流”视角,探索我国高职院校建设的价值、追求和路径,对于激发高职院校的内生动力、克服低位运行和被边缘化的问题、加强高职院校自我约束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高

职院校提质增效的建设演进中,要以更广阔的眼界、更严格的要求审视内涵式发展的体制机制与路径,不断丰富高职院校的时代内涵,直面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责任和担当。■

#### [注释]

①沈卫.解读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依存共生关系[J].职教论坛,2006(7):23.

②张佳.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4(10):50.

③刘红.2016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特点及趋势——《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2):9.

④王琦,邢运凯.高等职业教育文化逻辑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11):96.

⑤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中国高教研究,2016(1):69.

⑥李新建,李懿,魏海波.组织化人力资本研究探析与展望——基于战略管理的视角[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1):43.

⑦李茜.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EB/OL].(2016-12-13)[2018-05-03].<http://www.offcn.com/shi-zheng/2016/1213/18847.html>.

⑧李梦卿,杨妍旻.现代学徒制发展的诸种背景要素支撑功能比较研究[J].职教论坛,2013(16):20-21.

⑨陈寿根.增强高职院校管理有效性的路径选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5):197.

⑩杨振军.关于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布局的理性思考[J].江苏高教,2015(2):143.

⑪张君生.论职教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1(4):10.

⑫徐朔.“关键能力”培养理念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J].外国教育研究,2006(6):66.